

瞭解當代韓國民主政治

施正鋒 主編



瞭解當代韓國民主政治

施正鋒 主編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出版

瞭解當代韓國民主政治

2011 年 8 月 初版發行

編者 施正鋒
發行人 莊錦農
出版者 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地址 (10694)台北市光復南路 102 號 11 樓
電話 02-2778-8152
製作 金華排版打字行
電話 02-2382-1169

總經銷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總經理 洪詩棠
法律顧問 曾榮振律師
地址 台北市 100 重慶南路一段 121 號 5 樓之 11
電話 02-2382-1120
傳真 02-2331-4416
網址 <http://www.hanlu.com.tw>
信箱 hanlu@hanlu.com.tw
大陸展售 廈門外圖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 廈門市湖里區悅華路 8 號外圖物流大廈 4 樓
電話 86-592-2986298

ATM 轉帳 107-540-458-934 中國信託城中分行 (代號 822)
郵政劃撥 15718419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加入會員，直購優惠。

書局缺書，請告訴店家代訂或補書，或向本公司直購。

定價 新臺幣 300 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瞭解當代韓國民主政治 / 施正鋒主編. -- 初版. -- 臺
北市：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11.08

面：15×21 公分 (台灣國際研究叢書：15)

ISBN 978-986-86095-4-9 (平裝)

1. 民主政治 2. 韓國

574.32

10001568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倒裝，請寄回更換)

目次

1	南韓的民主轉型——以光州事件為分水嶺. 朱立熙	1
2	韓國民主化與國家認同 ——美國、核武、與統一..... 紀舜傑	35
3	韓國民主轉型的形成與延生的問題..... 郭秋慶	57
4	南韓總統的選舉制度..... 李憲榮	91
5	當代韓國政黨政治之發展與挑戰..... 石忠山	117
6	韓國體育運動歷史演進與民族主義之形成 黃東治、連恆欣、何金樑	161
7	《訓民正音》語文政策與韓國文字之崛起 蔣為文	203
8	韓國的職業教育..... 胡茹萍	223
9	進入 21 世紀以來的南韓與東協經貿關係 劉德海	251
10	韓國國防武力與東北亞安全..... 吳東林	281
11	北韓戰爭邊緣政策的形成與國際環境... 李明峻	313

1 南韓的民主轉型

——以光州事件爲分水嶺

朱立熙

「知韓苑」執行長、政治大學韓文系講師

壹、前言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迄今六十五年間，落實西方民主制度成功的亞洲國家只有台灣與南韓，而且都同屬「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儘管台、韓民主化的發展軌跡與步調相似，但是由於民族性、國族主義不同，兩國的發展歷程也呈現不同的樣貌。相較於台灣的「寧靜革命」，或謂「分期付款式的民主化」（若林正丈，1994），南韓的民主化一路走來更爲悲壯、艱辛與暴力。本文擬就南韓在二戰之後的民主發展，如何從「極權暴政」到「極致民主」，以及 1980 年的「光州抗爭事件」又如何成爲民主轉型的分水嶺，做一概括性剖析，就教於學界先進，並提供研究比較政治學的學者參考，期能做更深入的學理探索與研究。

2010 年是「日韓合邦」一百週年。韓國每逢西元的「十」年，必有大事發生。尤其二戰之後的六十年間，「逢十」發生的

每一重大事件，對韓國政治與社會的衝擊之大，以及對兩韓關係的影響，更是不容等閒視之。茲羅列如下：

1950 年：北韓揮軍南侵，三年韓戰確立分裂體制。

1960 年：「四一九學生革命」推翻李承晚政權。

1970 年：工人全泰壹自焚自殺，引發工運勃興。

1980 年：血腥鎮壓光州，成為民主化與反美的契機。

1990 年：朝野三黨野合，孤立百濟人金大中。

2000 年：陽光政策奏效，南北韓舉行歷史性高峰會。

2010 年：西海海域衝突。天安艦沉沒事件與延坪島砲戰。

由這些重大事件，來追溯事件發生年代的政經社背景，大約可以探索出事件發生的導因，並且對後續的發展及影響，也能夠梳理出一些脈絡。若粗略以「威權」與「民主」的二分法來區隔，1948-88 的四十年間，可算是「威權時期」，其中包括了：李承晚總統的 12 年文人獨裁、朴正熙的十八年軍人獨裁、全斗煥的九年軍人獨裁；其後，經過盧泰愚政權五年的轉型過渡期，到 1993 年金泳三的文人執政、還政於民，以迄於金大中、盧武鉉，到現在的李明博政權，則算是「民主時期」。

南韓從威權政體轉型到民主政體，是由「僵局」到「突破」的歷程（倪炎元，1995）。猶如其兩極化、非黑即白的民族性。朴正熙時代如此，全斗煥時代亦復如此。先來檢視朴正熙獨裁政權末期的僵局狀況。

貳、獨裁暴政

一、「緊急命令」治國（1974-79）

朴正熙爲了三選連任而在 1972 年 10 月強行制訂「維新憲法」之後，爲了加緊控制與擴大權力，同時遏止日益高漲的「反維新體制」的社會運動，從 1974 年 1 月 8 日，接連發佈「緊急措置」（即僅次於「戒嚴令」的「緊急命令」）第一、第二號，禁止一切有關修憲的討論，爲「緊急命令治國時代」揭開了序幕。十天之後，又宣布第三號緊急命令，爲了因應國際油價暴漲所引發的不景氣，但效果旋即被斷然調漲的各項物價所抵銷。

此後，爲了防止學運並炮製「人民革命黨事件」之後，又宣布了第四號。到了 1975 年 5 月 13 日，頒佈緊急命令第九號，較第一號更加強化限縮人民的基本權與表達的自由，不容許對體制有任何挑戰，也不准許詆毀國家元首，人民最基本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學術、良心等的自由都消失了，再加上行之多年的「宵禁」，全國人民連行動的自由也被剝奪。

朴正熙政權靠超越憲法權限的緊急命令治國，並且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權於一身，越來越走向「法西斯主義」與「國家社團主義」來治國，顯示這個政權管治社會衝突的能力，已經完全喪失（東亞日報社，1988：216-21）。

1970 年代的後半，韓國人民生活在被稱爲「緊急措置第九號時代」。朴正熙軍人獨裁政權的暴政，無所不用其極地扼殺民

主、人權與人性尊嚴。但是越是高壓的統治，遭致人民的反彈與抗暴也越大，到 1979 年時，勞工抗爭事件達 1697 件，正好是 1970 年的十倍。

維新體制與緊急命令治國的「政治惡」的最後爆發，就是獨裁者朴正熙遭到殺身之禍。1979 年 10 月 26 日晚上七點四十分，在宮井洞中央情報部餐廳聚餐的時候，獨裁統治十八年的朴正熙總統，被中情部長金載圭的槍彈射殺死亡。這是執政當局內部的權力衝突，以及維新體制的封閉性所導致（東亞日報社，1988：262-67）。當時被譏為「嚴冬共和國」的獨裁政權，終於消失於歷史。

儘管絕對的權力消失了，但是絕對權力之下所培植出來的既得利益勢力與支配集團，卻仍存續於體制內。一群野心勃勃的政治軍人正利用朴正熙死後的真空與亂局蓄勢待發，圖謀接手國家權力。維新體制的餘毒，並未隨著朴正熙的死亡而落幕，它預告了 1980 年更血腥悲劇的不可避免。

二、肅軍政變（1979. 12. 12）

朴正熙遇刺之後的權力真空該由誰來承繼呢？當時美國的卡特政府認為，「最理想的辦法就是依靠韓國軍方」（朴世吉，2005），因為那是南韓唯一擁有「有效力量的權力機制」。在當時的南韓，人民受教育仍未普及，在民智未開的社會裡，軍人是獨特存在的菁英集團，也是自視甚高的支配階層。一般而言，當時他們的知識水平高於整體社會的平均值，而且還擁有軍事戰鬥技能，所以是一支菁英力量。這股力量在 1961 年朴正熙發動軍事

政變成功，接著又掌控政權的十八年當中，形成了無可撼動的權力集團，對南韓的政治與社會文化影響至深且大。

於是，南韓陸軍官校正科班第一期畢業的全斗煥少將乃趁虛而入。全斗煥這一期軍官有相當強烈的自負與使命感。也因為是受過美式正規軍事訓練的第一期，讓朴正熙政權與南韓各界特別寄予期待，使他們成爲天之驕子，而且不免恃寵而驕。當然他們對權力的野心，也就超乎尋常了。

朴正熙遇刺一個半月之後，當時擔任國軍保安司令的全斗煥，發動以下剋上「雙十二政變」，逮捕了當時掌控軍權的陸軍總司令兼戒嚴司令鄭昇和，實質控制了軍方。這場政變因而也被稱爲「肅軍政變」（森山茂德，2005）。

但是，靠政變掌握軍權的全斗煥等少壯派軍人，並未能夠實質掌控政權；對行政官僚部門若無法操控，就不可能控制全國的政治機能，也無法管治人民。於是，設計出光州事件的「陷阱策略」，來逼使光州人民一步步地落入陷阱之中（朱立熙，2007：54-57）。

長期被朴正熙「維新體制」高壓統治的南韓人民，從七十年代後半期就積極展開民主化抗爭。特別是在朴正熙遭金載圭弑害以後，人民以爲維新體制將隨著朴正熙死亡而落幕，讓韓國人民可以對營造一個全新的民主社會充滿高度期待；除了民主政治的落實，他們也熱切盼望「基本的生存權」能夠得到保障。所以，韓國人將 1980 年年初幾個月間，政治氛圍的丕變以及民主化的胎動，以「布拉格之春」做比喻，而稱之爲「漢城之春」。

但是，全斗煥等新軍部勢力無視於人民對民主的熱切期待，

也頑強抗拒人民要求他揭示民主化日程，於是引發大學生在全國各地持續示威抗爭。

到五月初，學生運動就從校園民主化運動轉而成爲全國性的政治抗爭運動。5月10日全國各大學學生會長一致決議並發表聲明要求「立即解除非常戒嚴令」。激進派的學運勢力在5月12日晚上，衝到漢城市中心的光化門一帶示威，爲全面展開的街頭民主化鬥爭揭開了序幕。

新軍部也著手實施所謂的「忠貞訓練」，在2月18日調集全斗煥御用的空降特戰部隊與大都市附近的部隊加強鎮暴訓練。這是爲了因應三月初各大學即將開學，可能面臨新一波大規模的學運抗爭而調訓。忠貞訓練主要是讓軍人採取「強勢的攻擊性鎮壓」來對抗學運（朱立熙，2007：45-46）。

南韓兩股最強大勢力：軍方勢力與學運勢力的全面衝突，已經是箭在弦上。1980年漢城之春，就在混沌、緊張、期待的局面下，等待著歷史新頁的開展。

以國立全南大學爲主力的光州學生運動，將5月8日至14日訂爲「民族民主化聖會週」，他們發表了時局宣言。在14日他們走出校園到市內街頭抗爭。七千多名學生下午齊聚在全南道廳前示威。到16日，光州幾個大學的學生與市民共約五萬人群集市中心示威，晚上並舉行燭光晚會。

光州與全羅南道地區是朴正熙獨裁統治期間刻意忽視經濟發展的地方，全羅南道人民對軍人統治本來就積怨很深，對於新軍部的橫行，自然準備全力抗爭到底。全斗煥等一幫政變勢力則正在縝密地籌畫一場殘酷的鎮壓攻勢。對新軍部而言，只有透過一

場武力鎮壓的行動，才能向全國人民炫耀它的霸權力量(朱立熙，2007：48-50)，以及它已經實質掌控權力的象徵，因此流血事件的發生在這些軍頭的策劃下已勢所難免。

新軍部的焦躁感充分反映在對全軍部隊下達非常戒備命令，並對全國公務員下令進入「非常勤務」狀態。17 日零時，戒嚴司令部在國防部召開全軍主要指揮官會議，決議向總統建議：一、非常戒嚴令擴大施行全國；二、各級學校停課；三、解散國會；四、設置「國家保衛非常對策會議」。崔圭夏總統接受了軍方的建議，於是宣布自十八日零時起除濟州島之外，全國進入非常戒嚴。

同時，17 日傍晚警方突襲梨花女子大學，逮捕數十名正在召開全國學生會長團會議的各大學代表，也在當天午夜前，在全國各地強制逮捕了數十名民主人士。新軍部為全面戒嚴作戰做了萬全的部署與準備作業。當時，光州市內與校園雖然沒有示威活動，但是子夜之前戒嚴部隊已經悄悄地佔領了光州各大學，光州當地的學運、社運領袖也都被逮捕了。

當局並捏造反對陣營領袖金大中在幕後操控，是有計畫的武裝起義，而以涉嫌內亂陰謀將他移送軍法審判，並指控光州的抗爭是由潛伏的間諜、激進份子等所煽動，才使光州市民積極參與暴動，要讓將展開殘酷的血腥鎮壓「師出有名」。

參、國家暴力——光州事件(1980.5.18-5.27)

宣佈擴大戒嚴的同時，新軍部已在漢城、釜山、大邱、光州等主要都市投入忠貞部隊。他們把漢城與光州當做主要的攻擊目

標，在漢城與光州部署空降特種作戰部隊。這批全韓最精銳的部隊，在過去幾個月間密集地接受鎮壓示威訓練，然後滿載著鎮暴與戰鬥裝備南下光州。

在 5 月 18 日上午，國立全南大學兩百多名大學生齊集校門前展開示威抗爭。由於空降特戰部隊的殘暴鎮壓，導致數十名學生負傷，憤怒的學生於是轉戰光州火車站與市中心各地示威，而繼續遭到特戰部隊以棍棒與刀槍的殘酷襲擊，造成不少人傷亡，並有四百多名學生與市民被逮捕。戒嚴軍對不分男女的無辜市民與以及路人的濫行施暴，超越一般人常識所能想像的武裝暴力鎮壓，激起了光州市民的公憤，於是自 19 日起紛紛加入學生的抗爭行列。

5 月 20 日下午，超過二十萬的光州市民組成示威隊湧上市中心錦南路，並佔領了光州市政府，群眾示威有愈演愈烈的趨勢。特戰部隊的鎮壓越蠻橫，市民的抗暴就越激烈。沒有人在街頭袖手旁觀，市民都以必死的決心加入抗暴的行列。傍晚時分，被激怒的計程車司機也加入抗爭，兩百多輛車子開著大燈浩浩蕩蕩開到錦南路，為示威群眾助勢，群眾的歡呼聲震徹雲霄。

晚上十一點，光州新車站前傳出槍聲，駐守當地的第三空降旅因為群眾開車企圖衝過封鎖線而對著群眾開火，前面的群眾紛紛中彈倒地，有兩人當場死亡。

21 日下午一點，道廳屋頂上的擴音器突然響起國歌，這是特戰部隊開始攻擊的暗號。軍隊齊一動作趴下，開始對路上的群眾開火射擊。在各大樓頂上的狙擊手瞄準了示威隊伍前帶頭的人，逐一開槍射殺。原本期待可以和平收場的群眾，在憤怒與恐

懼中破滅了希望。錦南路成了一片血海，人潮散去的寂寥中，只剩下受傷者的呻吟（518 研究所，2005）。

有多少人在這場集體開火攻擊中死亡，迄今沒有公開。根據軍方在 1988 年發表的文件，以及接受受害者申報的數據顯示，當時至少有五十四人死亡，五百多人受到輕重傷。究竟是誰下令軍隊集體開火？仍然真相不明。

為了對抗戒嚴軍的砲火攻擊，被激怒的示威群眾於是從下午兩點半開始搶奪光州鄰近城市警察局、派出所以及後備部隊的軍火庫，以槍械彈藥自我武裝之後組成「市民軍」，全面與戒嚴軍抗戰，原本的群眾示威演變成街頭槍戰。

27 日清晨四點一過，槍聲開始響起。市民軍以兩三人一組，分別部署在道廳正面與側面的牆角，並且從一樓到三樓的窗邊俯視廣場的動靜。第三空降特戰旅的特攻隊分成四組包圍道廳，其中一組翻越過道廳後牆開始猛烈掃射，接著來自四方的槍聲大作。攻進道廳的特攻隊，踢開每一個房間門之後就對內瘋狂射擊，頓時之間，道廳內成為人間煉獄，慘叫哀嚎聲不絕於耳。

在槍聲與哀鳴聲中，有任何的人跡動靜的地方，就會遭到槍擊。這正是「掃蕩暴徒作戰」。開火到大約到清晨五點十分，幾個主要據點已經被戒嚴軍完全控制了；道廳是最後一場戰鬥，死守奮戰的市民軍幹部全部遭到格殺。前後一個半小時的掃蕩作戰結束，這場歷時十天的光州民眾的民主化武裝抗爭終告落幕。

這場殺戮作戰，死亡人數究竟多少，始終官民各說各話，莫衷一是。光州市政府以及「518 紀念財團」後來發表的數字是，154 人死亡（包括 12 具無名屍），70 人失蹤，4,138 人傷殘，總

傷亡人數為 4,362 人（518 紀念財團，2005）。民間則說高達兩千人遇害（Lilley, 2003: 259），數字不免失之於誇大，不過以訛傳訛之後，已經成為定論了。而實際的財產損失，包括公共設施、建物毀損、武器與軍備等，根據戒嚴司令部的估算一共為 266 億韓元（當時約合四千萬美元）。

肆、追究真相的抗爭（1981-87）

全斗煥血腥鎮壓光州事件後，達到充分震撼全國的效果，進一步掌握了實權，而在三個月後當選總統。隨後，在他領導的「第五共和」期間，光州事件的真相一再被掩飾、歪曲，甚至是不可碰觸的禁忌。政府當局將事件定性為「金大中等親共主義者主導的內亂陰謀事件」，嚴禁所有對光州事件的報導、討論，以及相關出版品的發行。

儘管在高壓肅殺的氛圍下，死難者家屬和受傷倖存者還是組成了幾個不同的團體，包括：「收押者家族會」（1980）、「518 光州義舉遺族會」（1980）、「518 負傷者同志會」（1982）等。這些團體在每年的 5 月 18 日，儘管政府當局的強力干預與鎮壓之下，仍都會試圖舉行追悼會；並在歷次抗爭中，逐漸形成「追究真相」、「懲處元兇」、「賠償受害者」等共識。這些社運團體後來在平反光州事件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從光州事件次年起舉行的追悼會，都被當局視為非法集會，而有數十人被逮捕。1984 年的追悼會與示威，有八十多人被捕；1985 年成立「建立 518 受難者紀念碑及紀念活動籌備委員會」，

有五百多人參加了追悼會及悼念彌撒。1986 年有一千多名受難者家屬和大學生舉行追悼會及示威。1980 及 1985 年，兩名工人要求追究真相而自焚身亡。

以「社會良心」自居的大學生，在揭露政府企圖歪曲與掩飾光州事件及追究真相的過程中，一直是扮演衝鋒陷陣的角色。1980 到 1985 年，反政府大學生一共佔領三次美國文化中心（光州、釜山、漢城），並縱火抗議美國默許對光州的屠殺。這些抗爭行動都成為國際新聞，引起國際社會與韓國人民對光州屠殺的注意。

天主教及其他宗教團體，每年都舉辦追悼會為死難者祈福。「光州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當年在屠殺鎮壓開始後，曾經大力疾呼停止屠殺人民；為了突破新聞封鎖，更分派神父到漢城講述事件過程，以及到羅馬促請教廷制止韓國當局屠殺人民。

在光州事件七週年時，該會首次出版了光州事件資料集與畫冊，並舉行紀念活動。漢城的「天主教正義具現司祭團」更發表反政府聲明，並放映德國與日本帶回來的光州事件過程錄影帶。

當年四月，全斗煥發表聲明拒絕修憲，試圖長期執政，引發學生與人民強烈抗爭。年初發生的大學生朴鍾哲被員警刑求致死的事件，被天主教揭發；接著，大學女生權仁淑遭惡警「性刑求」的醜聞爆發，六月又發生大學生李韓烈被鎮暴警察的催淚彈擊中死亡，專制政權下國家暴力事件一再發生，引發全民公憤而引爆全國性的六月抗爭。強力爆發的社會力量，已經為武夫獨裁政權敲下喪鐘。

1987 年的「六月抗爭」，讓一向對政治冷漠的都市中產階級與白領階級都湧上了街頭。全國大小社運團體串連在六月十日成

立「泛國民運動本部」¹，為全民揭竿起義對抗獨裁暴政掀起最高潮。六月二十六日並發動全國二十多個都市舉行數百萬人的「和平大遊行」。

在這樣緊繃、臨爆的僵局之下，美國雷根政府與國會對全斗煥政權的頻頻警告，並施壓絕不許使用武力鎮壓，也不准發布戒嚴令，要求給予人民「完全的民主」(Lilley, 2003: 271-73)，以及美國奧會主席羅伯·赫彌克警告，「如果安全受威脅，美國將不參加 1988 漢城奧運」(Pound, 1994: 392)，都發揮了關鍵性力量，迫使軍事獨裁政權不得不低頭。

南韓民眾展現「人民的力量」抗爭，持續達一個月、煙硝瀰漫全國都市街頭，最後迫使當時執政黨提名的總統後選人盧泰愚向民意投降，發表總統直選、保障言論自由等一共八項的「629 民主化宣言」，使得緊繃到一觸即發的政局得到了緩解。盧泰愚這一「賭徒式」的爆炸性宣言，使他在兩金整合失敗而各自參選的情況下，在當年十二月的總統直選的選戰中勝出，而「愚」翁得利。

伍、轉型正義的落實 (1988-2003)

南韓對光州悲劇的清算與平反，是在漸進的民主化轉型過程中逐步得到落實的。南韓的社會運動勢力與在野黨扮演了極為重

¹ 610 是執政黨提名盧泰愚為總統候選人的日子，運動本部選在當天成立，成為掀起全國性抗爭的契機。

要的角色。他們對政府當局的持續抗爭與壓力，讓政府當局不得不去面對問題，並尋求解決與救濟之道。而且清算過程，從初期的消極態度走向積極，也牽涉了政治鬥爭實力的消長，以及朝野攻防的謀略與現實的算計。1988 年之後漸進的清算作業過程，大體上可以區分為：政治抗爭與論戰的階段、司法處理的階段，以及轉換為制度性清算與民主機制建構的階段。

也就是在盧泰愚政權時期（1988-93），是以「國會聽證會」來調查光州屠殺與第五共和的貪瀆真相；在金泳三政權時期（1993-98），是將軍事政變與光州屠殺主謀者，以及貪瀆腐敗的威權領導人移送司法審判；到了金大中政權時期（1998-2003），則是將一些清算過去的未解決問題公布出來，並透過立法與制度性的設計來保障人權。如此，三任政權各有所司，也各有所成，也才保障了對過去的清算，獲致可觀的成就。

一、盧泰愚政權時期（1988-93）

盧泰愚當選之際，對於前朝全斗煥一夥新軍部勢力所犯下的政變奪權與大屠殺的國家暴力罪愆，原本並不打算清算，因為一則他自己也是新軍部勢力的核心共犯，參與了政變，再則因為他是全斗煥的接班人，繼承了第五共和與民主正義黨的遺產與使命。如果清算全斗煥，勢必也會清算到自己，極可能因而「動搖國本」。

但是由於他當選只獲得三成六的支持率，少數政府自然使他領導的權威性不足。以致於 1988 年 2 月一上任，在野黨與社運勢力就強烈要求他清算過去。當時的社運團體把自己定位為「民